



执行主编/李银河

家庭与性别评论

Family and
Gender Review (Vol.2)

本辑主题：中国性别研究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

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熊秉纯

“铁姑娘”再思考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金一虹

“银花赛”：

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高小贤

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刘伯红 卜卫

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

——“缠足”美丑与身体政治.....杨念群

女性主义与性工作.....李银河

“他者”的经验 and 价值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吴小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Vol.2

家庭与性别评论

Family and Gender Review (Vol.2)

(第2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

执行主编/李银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庭与性别评论 (第2辑) / 李银河执行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97-0893-4

I. 家... II. 李... III. 家庭社会学-研究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3529 号

家庭与性别评论 (第2辑)

执行主编 / 李银河

出版人 / 谢寿光

总编辑 / 邹东涛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江利亮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总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309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0893-4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本辑编选的是 1995 ~ 2007 年海内外性别研究（使用中文发表）的主要成果。自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我国兴起了性别研究的一个小高潮，以性别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因此这个选辑无法避免挂一漏万的命运。

熊秉纯的《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探讨了性别研究中质性研究方法的价值。论文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向传统的特别看重定量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研究提出挑战，认为质性的研究方法不仅为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而且从认识论上对所谓价值中立的纯客观的知识获取过程提出质疑并另辟蹊径。作者雄心勃勃地提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建构知识体系”。不管她的雄心是否能够实现，至少论文中已经勇敢地提出要摒弃空洞的词汇，要给个案研究一席之地，以及要检视研究者个人因素在研究中所隐含的问题，并且对她的论点作出了有力的论证。

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一文，通过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形成女性在多种行业就业、与男性劳动者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是该文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文章分析了这两个典型性别分工模式对女性劳动者的影响。调查发现，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高小贤的《“银花赛”：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一文的主题，是 20 世纪 50 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论文通过大量的口述实录和文献档案，分析了

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论述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劳动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

刘伯红和卜卫的《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在我国第一次运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电视广告传媒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揭示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所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国电视广告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如果存在性别歧视，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如果存在性别歧视，解构广告以说明这类广告的性质。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国的电视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倾向。文章分析了我国性别歧视广告的主要特征，认为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为角色定型。男性的科技专业霸权是角色定型在科技变化和发展时期的特有表现，也是角色定型特点的补充。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不符，电视广告没有充分肯定妇女的社会作用和贡献。

余晓敏和潘毅的《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一文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问题，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形成的特殊阶级、性别、城乡、族群等社会结果造就了打工妹特殊的主体性。消费革命的到来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对于打工妹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从中国消费革命的社会现实出发，将主体性社会建构的空间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探讨了消费革命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分析了新生代打工妹的独特消费模式。文章着重探讨了新生代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是如何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合力下，在生产领域被建构成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而打工妹们又是在消费领域进行再造，渴望成为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以及这种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是如何相互建构的。

杨善华和柳莉的《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以宁夏Y市郊区巴村为例》一文认为，国家与农民对于村干部选举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不同的考虑，背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的区分。农民对村庄政治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农民的日常交往行动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从而使村庄政治与农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现“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现象。而且，恰恰是因为村庄政治的存在，农村妇女才可以像男性村民一样，通过日常交往去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并得到村落社区的承认和肯定。文章提出，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关注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从而发现

村庄政治背景下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点，深化对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认识。

郑丹丹的《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织关系》，通过对四位下岗女工的分析，揭示出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质疑划分“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理论，反对将家庭当作一个整体和独立的研究单位，认为家庭中的男性统治是男性权力的一部分。

李树茁和古波塔（Monica Das Gupta）的《性别歧视和婚姻挤压——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中国、韩国和印度的家族制度和婚姻体系，考察了导致妇女低下的家庭地位和对女性歧视的原因。文章从家庭相对资源约束的角度，以这三个国家的家庭制度、婚姻体系和1920~1990年社会历史中使家庭受到严重资源约束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研究了性别歧视对婚姻市场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杨念群的《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缠足”美丑与身体政治》一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妇女的缠足习俗以及围绕着这一习俗所展开的种种观念、制度和话语权的争夺，在缠足是美是丑的问题上展开了性别话语与身体政治的激烈论争。妇女在缠足问题上是否仅仅作为被动的审美和施虐的客体，还是主动参与的主体？科学话语在反缠足运动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国家控制甚至暴力在反缠足运动中又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丰富的史料、文本为依据，重现了缠足与反缠足的历史过程，对这个曾经关系到几乎全体中国女性身体与命运的习俗的演变兴衰过程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解说。

唐灿的《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一文，是对性骚扰问题的一项经验研究报告，意在说明不同国家、地域、阶级、阶层的妇女问题的多样性。文章描述了城市中外来女工所遇到的性骚扰问题，分析了她们因性别身份和就业身份而受到的双重歧视，并揭示了妇女群体内部以地域和阶层为界的利益及地位差异。与西方女性主义将性骚扰归因于不平等的性别制度有所区别，该文作者认为，外来女工性骚扰问题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以及因就业身份差别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

陈兴良的《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一种法解释学的分析》，并不是一篇以性别问题为主题的论文，但是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妇女地位有关的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没有、能不能和应不应设立婚内强奸罪

名？他从法律的角度论证了婚内强奸不能按照现行刑法被认定为强奸罪的理由，并建议对婚内强奸在立法上予以犯罪化认定。

李银河的《女性主义与性工作》一文论述了从女性主义立场应当如何看待性工作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女性主义在卖淫问题上遇到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卖淫现象的存在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反映，是女性主义力图加以改变的；另一方面，性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处于贫困、危险的境地，一味严厉打击的态度又是女性主义从保护这些妇女的生存和工作权利的角度所不敢苟同的。文章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在卖淫问题上的论争，提出了作者认为最符合女性主义原则又最能帮助这个从事特殊行业的弱势群体的解决办法。

程为坤的《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介绍了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情况。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80年代，性别研究逐渐取代妇女研究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女性主义者改变了中国妇女传统的牺牲品形象，还原了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们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性、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试图找出中国妇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压迫与受歧视的根源。现在的新倾向是，西方学者开始放弃西方中心论和普适性的妇女解放理论，注重在第三世界内部寻找造成妇女受压迫及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特殊因素。

吴小英的《“他者”的经验和价值——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一文，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介入社会学的背景，概述了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新尝试，并评价了女性主义在当代社会学中的影响。文章的结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仍处于尝试和徘徊的阶段，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在对传统范式的批判上远比在知识重建上做得要好。在获得学术界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学院派女性主义或多或少脱离了现实的政治实践和最终的解放目标。这些问题的存在迫使女性主义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研究策略：他们既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学者，也不能使研究沦为服务于运动目标的简单工具。所以，在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中出现的普遍倾向是：强调学科边界的式微和学术边界的式微，在跨学科领域以及跨学术和社会领域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李银河

2009年3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熊秉纯 / 1
“铁姑娘”再思考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金一虹 / 27
“银花赛”：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高小贤 / 56
我国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报告	刘伯红 卜 卫 / 76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	余晓敏 潘 毅 / 90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以宁夏 Y 市郊区巴村为例	杨善华 柳 莉 / 119
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	
——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	
交织关系	郑丹丹 / 133
性别歧视和婚姻挤压	
——中国、韩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	
..... 李树茁 Monica Das Gupta / 144	
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	
——“缠足”美丑与身体政治	杨念群 / 158
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	唐 灿 / 201
婚内强奸犯罪化：能与不能	
——一种法解释学的分析	陈兴良 / 215
女性主义与性工作	李银河 / 224
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	程为坤 / 247
“他者”的经验和价值	
——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尝试	吴小英 / 270

质性研究方法刍议： 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

熊秉纯

中国社会学的开端和发展与 19 世纪以来中国艰难坎坷的命运有关。究其学科学术传统，它有一个始于西方却不局限于西方的传统，一个由个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出发的传统和一个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的传统；^① 社会学在传入中国之初，人类学的传统由社会学出走，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② 1950 年代，社会学被指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社会学系遭关闭直到 1979 年为止，社会学的系统教学和研究中断了近 30 年。其间，思辨性的论证、由理论到理论的论著取代了具体研究。1978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由于初期主要的、大量引进的是美国社会学及其定量研究方法，西方的量化统计调查法以其“科学的”、“客观的”、“现代的”光环，被奉为唯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由社会学系重新设立到现在，又有 20 年。综观这 20 年社会学的发展，在研究的议题、方法，以及发表的成果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③ 回顾过去，并立足于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笔者以为有必要在方法论的层面，对

① 称社会学而不称人类学是针对于（西方）人类学学术传统的批判。人类学是西方白人到非洲、大洋洲研究土著、原住民所建立起来的一门学问。

② 费孝通谈到他涉足社会学的初衷时表示：“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的，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的一些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之。”（费孝通，1992：190）

③ 对社会学 20 年来的研究进展，可参见张宛丽（1989）所做的相关研究综述，以及四部《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1989～1993，1992.7～1995.6，1995.7～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1989，1994，1996，2000）。

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进行反思；并引入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检视、整合社会学知识体系。

一 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社会学界经过了一个“补课”的过程。在这期间，笔者认为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反思。

其一，在西方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被引进的同时，在中国社会学界卷起了一股“问卷热”。“问卷热”所代表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为手段、以数据为学术语言来创建社会学知识的努力。20年来，在问卷设计、抽样、资料的收集、分析和表达等方面，虽然已经渐渐走出了早年蹒跚学步的“问题”阶段（风笑天，1989），但是，对于数据是不是描述社会现象和呈现人的七情六欲的唯一的、最好的工具这一议题的讨论仍然非常有限。^①虽然偶尔有学者对某一问卷调查提出质疑（风笑天，1987；卢小广，1987），但大部分以问卷调查为研究手段所出现的许多“幕后插曲”，只是不断地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学术圈子里流传着。^②

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往往拿美国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到中国来用，这些在美国一用再用的问卷和量表也都被研究者自然赋予了权威地位。殊不知这些问卷和量表是根据美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情况而设计的，它们不见得适合中国的情况。^③此外，一般常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量表和以“1~5”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还算满意”和“满意”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张三的“非常满意”和李四的“不满意”代表的会不会是一样的情绪？你的“还算满意”和我的“还算满意”可不可能指的是两码子事？也就是说，这

① 对此，有少数讨论，见李小方（1988）、张小山（1991）、吴小英（1999）。

② 本文会以笔者这些年来搜集到的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问题，为文的目的在于论事，不在于论人。读者会发现，文中所谈问题往往是普遍存在的，由此更说明，关键不在于某个特定人的言论或作品，而在于如何认识这些问题。为避免对作者或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伤害，笔者将以编号代替作者或当事人的本名，事例发生的地点有时也加以改动，只有年份保持不变。在记录上则以“（#13，南京，2001）”等字样表示。

③ 有一位资深的教育心理学教授表示，她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发展的心理健康问卷量表预测时，发现她所在教育学院的老师有好几位有精神病（#5，武汉，1997）。

些数据、量表，其实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要说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显示了用数据描写社会现象、个人经验的局限性。把西方发展设计的问卷和量表用于中国，不但会有削足适履的可能，而且还可能有指鹿为马的问题。

其二，一味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所隐含的问题。定量研究在社会学恢复后以“现代的”、“科学的”身份跃居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学术情境下，研究报告往往以有数据、样本大、用电脑处理资料来建立起其学术权威（风笑天，2000）。以“客观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自称的定量研究成了对所有研究成果生杀、褒贬的唯一标准。^① 其实，所谓的“客观性”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果真实并不存在，那么以“不客观”之实假“客观”之名的目的和结果为何？建立“普遍性”的目的为何？在多大程度上“普遍性”成了主流势力坚持和巩固其既得权势，并排斥压抑少数、弱势和边缘群体的手段？更何况，定量研究实证主义的前提是以“客观性”和“普遍性”建立其“科学性”，这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为标准的模式。人文社会学科所研究的现象和对象跟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有没有可能和必要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硬套于人文社会学科，这一直是西方学界讨论的议题。

其三，定量研究采用演绎法的研究论证步骤（deductive approach），研究者由既存理论（existing theories）推演假设（hypothesis），再由假设选出概念（concepts），进而界定概念，再根据概念的定义设计问卷。这样的演绎法研究论证步骤把既存的理论当成研究的开端，也就是说研究者从选题、提问开始就已经受既存的知识范畴的规范限制，这不仅对多年来学界讨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议题有深层的影响；而且使那些原来没有纳入既存知识范畴之内的、非主流的议题、社会现象，或是人生经验，难有机会进入知识范畴之内并开始对一种新知识的创造、累积和再造，更别开花结果了。

其四，研究者的角色和定位问题。在比较本土与西洋学者时，王铭铭

① 在一次研讨会上，与会者谈到以质性研究方法作出的研究成果很难得到编辑的青睐。一学者指出，想要在某些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没有数据根本免谈”（#7，1997，南京）。笔者另有一机会与一访问学者谈起其访问的收获，该学者表示此行影印了许多国外的问卷，可以拿回去用，因为在国内得到国外的问卷不容易，有时需向其他国内的学者花钱购买使用权（#11，2000，多伦多）。

很犀利地指出：“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学者在自我社会定位方面缺乏反思。中国本土人类学往往不自觉地依从于主流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并潜在地促成支配性的权力体系的复制。”（王铭铭，1998：214）^①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居于权威、主导的地位，研究者决定用哪个理论框架，怎么推演假设、界定概念、设计问卷。被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者）处于一个被动的、被审问的地位，他/她只能按研究者所设定的框架、所界定的概念和以研究者的话语来表达他/她的经历。研究者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大，其实只看到他/她想看到的现象，找到他/她想找到的资料。研究者本身的先念（pre-conception）和偏见（biases），往往在没有被检验的情况下影响着知识的创造和再创造。

其五，知识内涵和学术规范问题。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虽然研究报告渐为规范，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是仍然有学者认为，思辨性的论证有其可取之处。^② 在学术刊物、会议上，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结论仍然俯拾皆是。^③ 作者往往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证明他/她的观点、立论，也不对他/她怎么得到最后的结论做任何交代。但是，作者最后所作的断言（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根据，其所提观点只能算是断言），却往往被视为学术上的结论或定论，在学术圈内外流传。

二 社会性别研究的挑战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妇女这一群体的关心和研究已经有长足的

① 文中所指的不仅限于人类学，而是泛指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

② 例如，在谈到定量研究时，陈克艰表示：“社会上，人世间有许多事情，只要用心思想一下，体会一下，定性的结论并不难得。于此而一定要摆开架势从‘定量’方面弯弯地绕过去，就未免多此一举。”（陈克艰，1992：30）

③ 例如，在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未来的关系时，有作者对“社会趋同论”作出如下的论证：“‘社会趋同论’的认识，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社会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确也有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的成果，于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趋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将在未来的变革中演变为一种社会制度。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虽然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出现过一些共同现象，但它并不会导致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不会造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消失。”（吴曾基、吴鹏森、苏振芳，1997：17）作者并没有说明为什么“社会趋同论”的理论站不住脚，也没有以资料证明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不会消失。

进步，学者由初期的对妇女解放的再认识（李小江，1993；Wang，1998），到近日全面地开展学科建设的努力，重新检视现有知识内涵里的性别偏见，把妇女的经验纳入知识体系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把妇女置于主体地位等呼声已在学界渐渐传播开来（蔡一平、王政、杜芳琴，1999；王金玲，2000；杜芳琴，2000）。但是，到底怎样建立起一个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目前仍在探索阶段。^①而以上所述社会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对社会性别研究的萌芽、生根和发展则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她们的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之内，加上以社会性别的视角（gender perspectives or feminist perspectives）来解析问题的努力仍还在起步阶段，现有与妇女议题有关的论著中，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和想当然而似是而非的论调往往披着学术的外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学术界、大众传媒，以及校园课堂里广泛地散播流传。例如，在一篇《对贫困地区妇女精神贫困的分析及教育对策》的文章中，作者认为贫困地区妇女不仅要物质脱贫，还要精神脱贫，作者一开始就表示：

总体来看，贫困地区的女性比男性更缺乏见识，依赖性更强，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的承受力和耐力比男性更强，面对生活的重负和命运的不公更能够忍辱负重。正因为如此，她们宁肯承袭传统，逆来顺受，消极地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求突破；由于惧怕风险，面对社会发展引发的新旧冲突，她们更愿意选择守旧而不求创新。她们比男性更缺乏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往往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发展变化，把生活的希望和命运的改变寄托在男人身上。（#12，2001：1）

论述中所指的“精神贫困”，完全是刻板印象中对妇女负面的、描述性的空洞词汇（“缺乏见识”，“依赖性”，“消极被动”，“不求突破”，“惧怕风险”，“不求创新”，“缺乏主体意识”），其对于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的评比也毫无资料的佐证，连一些一般被视为妇女“传统的美德”

① 王金玲（2000）认为要摒弃定性（思辨）方法，注重定量分析；李小江（1996）则指出量化分析的有限性。

（“忍辱负重”以及“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困的生活状况的承受力和耐力”），竟然也成了妇女精神贫困的根源。^①

要建立起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研究，学者必须正视上述当今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流所隐含的问题，放弃以思辨性的论述玄想、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综述结论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习惯；深入讨论定性和定量研究隐含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而发展出严谨的治学研究方法。本文将从知识的内涵、知识建构的过程和知识建构的参与者三方面说明质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approach, or ethnographic research）对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并讨论质性研究对揭示现有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性别偏见或盲点可作的贡献。^② 本文所指的质性研究不同于国内一般所通称的“定性”研究。^③ 相对于定性研究，质性研究不是空对空、思辨性的，也不是以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推理来建构知识的，而是以文字叙述为材料（data），以归纳法（inductive approach）为论证步骤，以建构主义为前提的研究方法。^④

三 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建构知识体系

（一）摒弃空洞的词汇

要建构起气象一新的知识体系，首先必须摒弃以空洞的辞藻概念堆砌文句、写文章的习惯，代之以具体的材料、解析和批判的视角、对社会现象的分析研究。

-
- ① 类似的著作颇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但其共同的特质则不外乎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结论。
 - ②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一直是国内讨论研究方法的两大类，直到最近质的研究才逐渐展开。
 - ③ 陈向明起初把 qualitative analysis 译为“定性研究”（1996），后来意识到此译法可能造成误导，因而已改用“质的研究”一词（1997）。
 - ④ 王育民把定性研究定义为：“是对研究对象性质的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历史的、纵深的考察，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变化发展的规律。”（王育民，1989：7）张琢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则认为“定性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注重现状和注重历史研究的综合分析方法”，其研究过程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张琢，1998：62）。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讨论“定性研究”的内涵、出现的历史背景和过去20年的发展。

例如，阶级和社会性别是社会学上常用的抽象概念，研究者必须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它们的运作，并在社会学论著中呈现它们的关系。当笔者在台湾的家庭工厂做研究时，遇到阶级与社会性别两个概念以错综复杂的关系呈现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中。这些家庭工厂的规模不大（员工由1到30人不等），资金有限，大部分坐落在城镇的住宅区或农村的农户院落，其产品以外销为主，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基础（Hsiung, 1996）。对工人来说，这些家庭工厂里的老板娘总是站在厂方的立场，扮演着监督、剥削工人的角色，极尽所能地维护资方的利益，但是很多工厂的老板是不给自己的太太（即老板娘）工资的（有一次一个老板娘向她的先生抱怨说自己工作太多太累，想少做一点，老板看着她，指着眼前的轿车对着她和笔者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虽然老板娘的身份使她享受着一般工人不可能享受到并且很令工人羡慕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但是其无偿家属劳动者（unwaged family workers）的处境和身份，使得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连女工都不如，因为女工至少还有一份工资，可以掌握一点经济和消费权。同时，笔者做田野调查时也很清楚地看到，老板娘和女工都感觉并认识到自己身为女人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处境与经历，她们也在不同的程度和范围内对这种不平等待遇做出个别的挑战和回应，但是个别的性别认同没有办法化解双方阶级的对立。也就是说，老板娘和女工没有因为个人性别认同而联合起来挑战父权、男权结构。这个例子说明，在现有的经济体系里，女人的劳动参与往往被视为附带的；就算有收入，也只是用来贴补家用；在工资、升迁、考核、岗位培训等各方面，女人仍然面对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

中国妇女过去几十年大量就业的经验和成果，仍然没有为妇女争取到完全平等和公平的待遇。例如近些年才引起关注的城市里单位分房的问题、农村责任田的问题，这些现象由原来的视而不见、不知不觉，到意识到它是问题，对它提出挑战，整个过程就是社会性别意识觉醒的表现；但在解决问题时面对的困难也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体制仍然根深蒂固，继续影响着妇女的经验和发展。然而，在许多研究著作中，许多社会现象的存在往往以“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太落后”等笼统的、空洞的词汇来表述或解释。殊不知这样的词汇和表述只停留在表层，不但没有真正解释说明问题，也没有解析到结构层次的深层问题，更没有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和社会

文化规范制约下，以及在什么历史条件和时空里，这些“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还能在21世纪继续活生生地影响着中国妇女的经验和发展。细致深刻的解析，不但有助于挑战现有的男权中心的价值体系、知识内涵，而且能与社会上的妇女工作的实践者进行对话，共同探索出一些新的思路、指导原则和方向。

（二）个案研究的一席之地

个案研究在学界常为人诟病，指其只针对少数案例进行分析，因此所得的结论，不具“代表性”、“不可靠”，因而不能说明问题。以下笔者要举一个例子说明怎样由单一个案看到结构性的问题，进而了解社会运作的机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1980年代，在台湾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成长的年代，有一种特别针对已婚妇女发展出来的生产、雇佣方式。为了让这些已婚且有幼儿要照顾的妇女还能加入生产行列，工厂老板或把半成品送到这些妇女家里，完工后再去收回来；^①或是在住家的楼栋里租一间小房子，把这里当成工厂送半成品、收回成品的集散地，街坊邻里受雇的妇女都到这里拿半成品回家里做，做完后再把加工好的成品拿到这里，工厂派人定时来收货。这种通称为家庭代工的生产方式，论件计酬，厂方跟工人没有正式的、长期的雇佣关系。在每年生产旺季时（通常一年只有几个月），工厂可以以此方式，深入社区，调动已婚妇女的生产劳动力；生产旺季一过，这些已婚妇女回到她们原来的“家庭主妇”身份，雇主（资方）不需对她们（劳方）负任何责任。工厂老板往往认为自己为已婚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所以常以恩主的心态跟这些妇女打交道，整个社会舆论、刻板印象，也不把这群已婚妇女视为加入生产行列的劳动力，家庭代工因而被认为是为已婚妇女提供了赚零花钱的机会，没有人在概念上认为她们有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也没有人把她们当工人看，觉得她们应受到跟其他工人一样的待遇和保护。

笔者在台湾的卫星工厂作田野调查的时候，认识了风媛，她当时已

① 这就是台湾当局当时倡导鼓励的“客厅即工厂”，它所要表明的是每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且应该兼为工人，加入生产行列，每一家的客厅都可以且应该变成工厂，为外销导向的生产经济体系作贡献。

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她的先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常在赌桌上耗日子。风媛在家附近的一个工厂租的小房间做彩绘玻璃（即根据厂方提供的图样，在大小不同的玻璃片上纹彩色花样，这些玻璃被用来当木制珠宝箱的门或窗）。这样她可以同时照顾女儿，中午还可回家做午饭给先生吃。那年7月的某一天早上我去找风媛，从她口中得知她的先生已经三个星期没上工了。那天，另一个在社区做代工的家庭主妇秀宝把她彩绘完的玻璃送到风媛这儿，等工厂的人来收。笔者经历、看到了下面的情景，听到了下面的对话：

风媛对秀宝说：“已经20天了耶！”

秀宝惊叫地问：“真的吗？我以为只有两星期。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是被人家炒掉的，还是自己不干的？”

风媛说：“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告诉我什么。我真希望他能消失不见了，或是死了都好！”

秀宝安慰风媛说：“快别这么说，男人都一样，我们家的那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至少你不需要养家，”风媛说，“别人是女人，我也是女人，为什么我们的命这么不一样？”

下午4点左右，风媛向沿街叫卖的小贩买了一袋豆腐脑（又叫豆花）给她的女儿春莲，她叫春莲：“拿回家，叫你爸爸帮你倒了吃！”

我和其他的四个社区的妇女站在门口聊天，不久春莲提着一袋烂豆腐脑回来，显然她在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袋子弄掉了，豆腐脑摔烂了。风媛看了，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大骂春莲：“你的爸爸是死了还是怎么了？你如果不想吃，为什么要我买？看你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风媛一把抓过来春莲手上的袋子，往垃圾箱就丢，但是她还是怒气未消，随手从地上捡了一根竹鞭子，朝春莲腿上就抽。

其他的妇女赶紧过去劝：“说不定她爸爸在睡觉！”“一点小事，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春莲曲着身子，蹲在地上，边躲边哭。

我过去，想把风媛手上的竹鞭子抢过来。

另一个妇女说：“够了，够了，不要再打阿莲了，她只是个小孩子！”